



“多元文明与中华民族”跨学科学术研讨会综述

杨瑞 王艳

`${article.titleEn}`

,

引用本文:

杨瑞, 王艳. “多元文明与中华民族”跨学科学术研讨会综述[J]. [学术月刊](#), 2022, 54(1): 208–210.

, . `${article.titleEn}` [J]. [Academic Monthly](#), 2022, 54(1): 208-210.

在线阅读 View online: <http://www.xsyk021.com/article/Y2022/I1/208>

您可能感兴趣的其他文章

Articles you may be interested in

[民族主义的历史镜像与旧体文学的命运](#)

Historical Mirror of Nationalism and the Fate of Old-style Literature in Modern China

学术月刊. 2021, 53(4): 173–180

[语言、考古和遗传学多学科视角下的印欧语系起源与扩散](#)

The Origin and Dispersal of Indo-European Languag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Linguistics, Archeology and Genetics

学术月刊. 2021, 53(5): 175–185

[良知、自然与科学之争：20世纪中国哲学的精神趋向](#)

Controversy among Conscience, Nature and Science:The Spiritual Tendency of Chinese Philosophy in the 20th Century

学术月刊. 2021, 53(4): 32–44

[礼乐美学与传统中国](#)

The Aesthetics of *Rites-Music* and Traditional China

学术月刊. 2021, 53(6): 171–182

[关于艺术学理论学科的文献学基础](#)

On the Standard Literature of Art Theory as a Discipline

学术月刊. 2021, 53(7): 161–167

[经验地研究法律：基于社会科学的外部视角](#)

Study on Law with Experience:Based on External Perspectives of Social Sciences

学术月刊. 2021, 53(3): 106–113

“多元文明与中华民族” 跨学科学术研讨会综述

杨 瑞 王 艳

2021年12月4日到5日,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学术月刊》杂志社联合复旦大学历史系举办的“多元文明与中华民族”跨学科学术研讨会于上海举行。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来自全国各高校的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等学科中青年学者济济一堂,从各自研究领域出发研讨多元文明与中华民族形成的关系,重点探讨3到9世纪中古中国各民族的文明交流与融合。

大会分主题报告和小组研讨。来自内蒙古师范大学民族学人类学学院的纳日碧力戈教授、复旦大学历史系韩昇教授、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张晓虹教授、上海大学历史系徐坚教授分别做了大会主旨发言,从不同学科的视角切入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

纳日碧力戈教授高屋建瓴地指出,人类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时代的中国需要维护祖国统一、防患于未然,加强中华民族认同。在研究理论方面,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传统的符号学注重物感物觉、事物相指、象征意义的“三性”交融,强调物质和精神互为条件的过程关系,这意味着物感物觉离不开象征意义,二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开放互动中交融一体。中华民族探源实际上也涉及物感物觉、事物相指、象征意义的过程,涉及地上地下的实物,也涉及强调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这就要求探源工程有担当、负责任,在追寻和构建共有精神家园源头过程中,把文化认同放到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根”与“魂”的高度,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学术支撑。

韩昇教授《北周武帝之死与北周的文化政策》一文通过分子人类学技术,检测了北周武帝的头骨,并且根据北周武帝尸骨的鉴定结果,考索了武帝与道士及服食仙丹的关系。韩昇教授的研究指出,虽然北周武帝身边有一群激烈排斥佛教的道士群体,然而武帝禁佛并非道士挑唆所致,而是谋虑甚深的政治决断,目的在于通过尊崇儒学以建构国家文化,建设强大国家。同时,少数民族政权禁西来之佛教而自居中华之正统,此政策方向为后继王朝所继承。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张晓虹教授则重点介绍了中国历史地理数据平台建设的相关情况。谭其骧先生主持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编纂工作对于中国历史地理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也存在传统纸质历史地图集固有的不足,比如标准年代的代表性、使用者再加工便利性等,因此信息化、数据化的历史地理信息管理被提上日程。张晓虹教授介绍了以复旦大学史地所与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合作的CHGIS项目为代表的以往数据成果,在2016年该项目结束后,2017年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在此基础上逐步建设中国历史地理数据平台,并于2021年初开放。张晓虹教授从设计架构、学科意义等四个方面对该平台进行了介绍,希望能够进一步探索开放的数据共享机制、支持历史地理和多学科交叉综合研究,以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

徐坚教授题为《三星堆的双线与四维:从宝物到文明》的报告,从三星堆如火如荼的发掘工作引出对于考古学本身的反思。他敏锐地指出,上新不仅仅是器物,更是发掘、保护和研究,其根本目的在于探究考古学在当下的语境中应该如何进行自我定位和表述。徐教授从三星堆1927年、1986年、2019年三个重要时间节点出发,简要介绍了三星堆的发现、发掘和研究情况。他的研究从器物坑个体层面、器物坑区域层面、到三星堆遗址层面徐徐推进,以呈现对三星堆的考古工作如何从复原一种行为到复原一种制度进而到复原一种系统。通过探查这个过程,考古学自身的发展取径、重要性以及未来的推进方向被予以深入剖析。大会报告之后进行了小组研讨,主要分以下几个方面。

中华早期国家、多元文明的交流与融合。本次会议考古学领域所展示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文明的交流与融合。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王辉研究员《考古资料中所见汉晋时期河西走廊的文化交融和民族融合》一文,介绍了以甘肃民乐八卦营城址墓葬为代表的相关考古发掘简况,包括墓葬形制、器物以及墓葬壁画、丝织品图案的基本情

况,从中深刻揭示了汉晋时代的河西走廊地区民族融合以及由此带来的各民族文化交融的影响。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田建文研究员《汉代骠骑侯几与骠国》一文,立足蒲县曹家庄墓地的考古发掘工作,对汉武帝元鼎五年(前112)所封匈奴骑兵长驹几“骠国”进行考证,并进一步分析汉朝“属国”管理体制。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王晓琨副教授介绍,自2018年暑期开始,中国人民大学与大同市考古研究所等单位联合,发掘大同云州区吉家庄遗址。在近三年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房址、墓葬、陶窑等遗迹,出土陶鬲、三足瓮、卜骨、骨哨等重要遗物,与晋南陶寺、内蒙古中南部的老虎山、朱开沟等周边文化有着密切联系。这些遗迹共同构成了4000年前晋北龙山时代丰富多彩的文化面貌。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李唯博士关注中原腹地,他的《大汶口文化西进中原的考古新证》一文聚焦于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土城王遗址。自2018至2021年对土城王遗址的考古发掘与整理工作,不仅完善了沙颍河平原仰韶至龙山文化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和年代框架,同时为研究中原地区史前社会复杂化和文明化进程提供重要的区域视角,反映了史前淮系文化对中原地区辐射影响的阶段性特点,见证了中原地区多元一体史前文化格局的形成与发展。上海大学文学院曹峻副教授则将研究重点从华夏文明初期的核心地带转移至“边缘”。她强调,中原作为文明的核心地带,其社会发展具有连续性、世俗性及等级性等重要特征,且“中心”与“边缘”的关系显示中原早期文明形态的“领土国家”模式。而偏处东南的太湖地区,良渚文化以其精良的手工业产品、规模宏大的土木工程建筑,不仅昭示本区域早期文明的出现,而且种种迹象表明,太湖地区的初期文明可能为不同于中原的、属于“城市国家”的社会形态。

中古历史文献的考辨与考古的发掘。中古中国是民族交流与融合的重要时期,本次会议对民族大交融时期尤为关注。内蒙古师范大学民族学人类学学院韦兰海教授《北族祖源叙事文本的历史人类学解读——以北魏拓跋力微的年表为例》一文采用历史人类学的分析方法,对《魏书·序记》中记载的拓跋部落创始人拓跋力微事迹的不合理之处进行探讨,从记忆断层、重构历史、隐讳事实、口传史料四个方面,重新解释了拓跋力微年表被构建、生年被大幅度提前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重拟了新的拓跋力微年表,试图对早期拓跋部的活动历史作出新的解释。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董刚博士细致检读了魏晋南北朝史籍,从中搜罗出为数不少且以往鲜有讨论的语音史材料,以此为基础对这一时期的鱼部元音高化、上古去声的韵尾保留、上古单元音的裂化复化、辅音腭化以及复辅音和具体韵部的音值等问题进行了尽可能详细的分析和讨论。魏晋南北朝史籍所反映的语音史信息表明这一时期语音演变兼具存古和新变的复杂特征,与《切韵》音系所反映的一致性区别较大,较为适应词汇扩散理论对于音变事实的阐释。该文对于我们了解这一时期的语音及词汇现象,以及以此为基础更进一步探讨当时的历史事实提供了难得的参考。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秦琼《文化交融视野下的中古汉地肉身葬》一文系统考察了中古时期的汉地的肉身

葬这一极具特色的丧葬形式。汉地肉身葬发端于僧人偶然状态下的尸身不腐,因死者身份的特殊性而被蒙上神异色彩,逐渐发展为有意识地保存僧人遗体。根据保存地点及方式的差异大体分为两条主线,一是将遗体放置在可以随时查看的地方;二是将遗体放置在相对密封的空间内。随着与佛教真身观念和舍利信仰相结合,肉身葬逐渐与肉身舍利信仰密切相连,在唐代以后使用愈发频繁,且逐步传入西藏、朝鲜半岛、日本群岛等地,影响深远。陕西师范大学唐史研究所胡耀飞副教授,他的《沙陀历史的旁观者——唐末河东史料〈三朝见闻录〉辑考》一文尝试对唐末五代史籍进行内容还原与价值分析。作者通过考察认为,《三朝见闻录》一书大约成书于唐明宗时期,其著者很可能是河东政权内部人士,甚至是后唐史馆成员之一。该书虽非纪传或编年体,但在时间等方面的记载有较高的可信度。根据从《资治通鉴考异》中辑出的26条佚文来看,该书对研究这一时期沙陀人的活动、唐末地方土团制度、关隘驻军制度等都有一定的史料价值。这一尝试对如何深入挖掘散佚严重的唐末五代史籍中的历史信息提供了一定参考。这些文献无不体现中古时期各民族文化交流互动。相对于文献,考古报告提供另一种还原历史的可能。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刘呆运研究员《长安洪渎原唐墓有关问题的思考》一文从墓地形成原因、墓主的身份与关系、墓葬等级、墓葬的文化特征四个方面对西安洪渎原地区分布的唐代高等级墓葬群进行介绍。洪渎原地区因地面开阔且距长安较近而受到青睐,墓葬众多,且墓主以皇亲国戚、世家大族及新贵官僚为主,目前以唐玄宗的外公窦孝湛墓级别最高。且窦孝湛墓的双墓室上方均发现有象征塔形的建筑,这种以墓为塔的现象明显是受到佛教的影响。此外该地区发现的豆卢建墓的地面围沟内还发现了十二生肖,是唐人新的时空观念的体现。青海省文物考古所李冀源研究员介绍了青海都兰哇沿水库官却和遗址与古代墓群抢救性考古发掘的情况。经过对部分墓葬棚木的树木年轮测年及遗物初步推断,这批遗存属于唐吐蕃时期,这对研究该地区古民族生活状况、聚落形态、手工业技术、丧葬习俗等问题提供了新的实物材料,其中出土的墨书古藏文卜骨与木简等文字材料更具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

科技考古与跨学科合作的研究。跨学科研究需要多学科乃至文理交叉,以问题为导向,运用多种技术和手段解决历史问题。特别是现在,科技考古手段可以帮助我们考察中华文明的生态环境、物质和匈奴族群起源的历史。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张萌博士《从流动到定居——中华民族形成的文化生态背景》一文,采用宏观生态学方法,对东北亚狩猎采集生活方式和生计转变的路径进行模拟,探索了各主要区域在新石器化的进程中社会演变背后的文化生态机制。该研究为探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的背景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胡耀武教授《稳定同位素示踪我国古代民族融合的“黏合剂”》一文采用“我即我食”的研究理念,对已发表的、不同时期和区域内考古遗址中人骨和动物骨的碳氮稳定同位素数据进行系统梳理,发现源自我国中原地区农耕民族的粟作农业,在欧亚草原青铜时

代至蒙古时期游牧民族的生存饮食及家畜饲养中占据重要地位,由此指出粟作农业是我国古代民族交流融合的“黏合剂”,为古代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之间相互融合及中华民族的形成奠定了深厚的物质和文化基础。同样利用同位素示踪技术,生彭菲将这种将技术运用到中古时期的北方民族群体食谱则是一大创新和发明。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生彭菲博士《农牧交融——北朝晚期鲜卑贵族群体的食谱研究》一文亦是采用“我即我食”的研究理念,对关中地区考古出土的不同等级北朝晚期鲜卑贵族,如北周武帝、阿史那皇后、晖华公主、乞伏孝达、元威夫妇、独孤宾和李裕的遗骨进行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结果表明,北朝晚期鲜卑贵族群体内部不同阶层的生存状态存在明显的差异,其中高等级贵族饮食中较多摄入麦类作物和肉食,保留了较多游牧民族的特征,而低等级贵族则摄入了相对更多的粟黍作物,动物蛋白摄入量相对较低,呈现出农牧交融的趋势。

跨学科最为引人入胜的则是分子生物学技术引入历史研究。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文少卿博士《古丝路沿线人群的融合史研究》一文着重介绍了其团队研究柯尔克孜族群起源的成果。其团队收集、检测了来自中国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与乌鲁木齐地区的298个男性样本,与116个欧亚种群,特别是中亚、阿尔泰语种群的7855个样本进行比对,发现柯尔克孜族群为双重起源,其主体部分来自青铜时代的古西伯利亚人,至中世纪又融入了部分蒙古人。柯尔克孜族群扩张的时间与中世纪蒙古的兴盛期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该研究综合运用了历史学、生物学、考古学、语言学以及分子人类学的方法,可谓以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探究中华民族起源的范例。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蒙海亮博士梳理发现,早期匈奴的谱系显示中国历史上“民族”众多,其中关于匈奴的研究成果最为丰硕。职是之故,自科技考古、新史学理论兴起以来,“匈奴研究”成为诸多新技术、新理论的试验场。他的研究借助整理国内外学者对蒙古高原匈奴兴起前后考古资料、墓葬遗骸的体质人类学、DNA分析,揭示了“匈奴人”的兴起、形成及其所体现的匈奴社会结构,为研究其他北方民族提供了相应参照。

边疆民族史研究。边疆民族是本次会议聚焦点之一,来自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陈浩副教授从全球史的视角出发,结合考古学、民俗学、语言学等讨论了突厥起源的多元叙事。他比较分析了汉文史料中的狼种起源说、希腊语史料中的斯基泰起源说,穆斯林文献中的雅弗起源说以及拉丁语史料中的突厥与法兰克共同起源于特洛伊说,认为族群起源的叙事,不能用简单的真伪标准来检视,而是要将其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探讨它们背后的政治和文化含义。不同史料中的多元叙事或明或暗地揭示了6世纪后才进入中原王朝视野的突厥与印欧语系民族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胡康博士《后突厥汗国末期史事新证——基于史源学的再考察》一文从史源学的角度,探讨了两唐书《突厥

传》对后突厥末期政局叙述的差异性。《旧唐书·突厥传》关于后突厥末期史事的叙述极有可能出自令狐峘的增补,其根本史料应是颜真卿所撰《康阿义屈达干神道碑》。《新唐书·突厥传》的史源则较为复杂:关于汗位更迭的记载主要来自柳芳的《唐历》,其他部分则多是编者对已有史料的重新删减、编排。通过对两唐书《突厥传》史源的分析,可以揭橥后突厥末期诸可汗的活动地域一直在漠北,而非漠南,九姓部落和唐朝在消灭后突厥的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秦中亮副教授《从李宝臣复姓看河朔蕃帅的族群认同与政治认同》一文对大历年间李宝臣改姓与复姓的原委进行了深入考察,认为其中充斥着李宝臣的族群认同与政治认同的交织与纠结。对于李宝臣而言,选择张姓就意味着以奚族酋长之子的身份示人,有利于进一步聚集藩镇内的同族将校,是一种族群认同的表征;采用李姓则标志着以皇族形象行世,更加容易获得李唐皇族的政治认同。复姓与改姓的七个月间帝国历史语境与藩镇政治规范的变迁,是李宝臣对于姓氏反复的根本原因。无论是改姓张还是复姓李都是为了攫取更多的政治资本,从而为其子李惟岳的袭位铺平道路。

在学术史方面,会议对中国自身边疆民族的学术史也进行了梳理。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刘琪副研究员首先通过分析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这一中国边政学形成的重要时期的相关论述,提炼出边疆建设中的两大核心任务在于“建制”与“化民”,即如何建立边疆行政管理体制及如何对待边疆地区与内地文化类型相异的人民。其次结合中共早期关于民族问题的相关论述及建政后的民族政策,指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从行政层面解决了边疆的“建制”问题,而在“化民”的问题上,则是用“团结”“发展”“共同富裕”等话语替代了以往的“教化”目标。西安外国语大学丝绸之路与欧亚文明研究中心黄达远研究员介绍了谷苞先生的疆域理论提出的历史背景、理论特色及其意义。为了解决新中国建国后中苏在边境问题上的争端,谷苞先生从河西走廊地区各民族共享的景观记忆切入,化解长城内外游牧社会与农耕社会这两种异质性社会的对立性,强调农牧生产形态之间的能量转化以及中国古代游牧历史与农业历史的统一性和连续性,论证了长城两边均是中国这一事实。这一疆域理论对消解“本部—边疆”二元结构的偏见提供了新的历史解释,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提供了坚实的历史依据。

本次大会,各位学者和与会人员克服了疫情期间的重重困难,在两天时间中集中进行近三十场高水平学术报告,别开生面地丰富了3到9世纪民族研究的问题域。在促进学术交流的同时,更深入发掘了“多元一体”民族观的历史依据,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学术支撑。

(杨瑞、王艳,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周奇)